

制度因素对江、浙两省 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陈 华 徐建华

摘 要：本文以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主题，通过对浙江省和江苏省1995~2007年间的实证研究，进行两省的比较分析。首先应用GRANGER因果检验讨论变量间合理的关系，并依次应用C-D生产函数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定量测算江、浙两省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制度因素，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江、浙两省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制度借助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关键词：制度因素；经济增长；非国有化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5-0071-09

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一直是经济学界最为传统和重要的部分，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将制度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研究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由于制度的定量化的困难，以及如何适当选取制度代理变量、如何获得有效统计数据、通过何种函数形式实现最佳拟合等问题，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成为了多年来的一个难点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政策与制度是彼此相关而又各有其内涵的两个不同概念，二者都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本文将主要从制度的角度，基于我国江、浙地区经济的发展背景和现状，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分析，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适当改进以有效测度具体地区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江、浙两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一、文 献 综 述

第一，从理论研究进展来看，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国内外有许多相关研究。以新

收稿日期：2010-07-08。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教委课题《制度因素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课题编号06MS040）的结题成果。

作者简介：陈华，（1977—）女，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徐建华：（1964—）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地理信息系统。

制度经济学家 Coase(1937)和张五常(Cheung, 1968)为代表,指出:“一个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制度变革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工作中,杨瑞龙(1998)对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了研究。其后,黄少安在杨瑞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黄少安, 1999),对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关系以及中国产权制度变革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并且验证了关于制度变迁的3个新的理论假说(黄少安, 1999, 2000),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事实对“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的证实(黄少安, 1999),产权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魏建、黄少安, 2000)。张曙光对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进行了研究(1998)。孙斌栋(2007)以上海为例研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于效梅(2008)研究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制度演化趋势。

第二,从模型的应用和进展方面来看,国外许多经济学者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对经济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计量研究。如 Jaggers 和 Gurr(1995)对产权关系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计量研究;Kaufmann 等(1999)通过对150多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对治理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因果关系;Hall 和 Jones(1999)的研究表明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差异对国家间的劳均产出有决定性的影响;(2)Alesina(1992)、Helliwell(1994)Barro(1996)对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研究;Chowdhurie-Aziz (1997)对非精英参与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3)对社会制度(非正规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研究,如 Narayan 和 Pritchett(1997)对坦桑尼亚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量研究;(4)对综合性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研究。主要通过对各种制度进行加权后进行计量研究,例如 Rodric(1995, 1996, 2000, 2002)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Mellinger, Sachs 和 Gallup(1998, 2000)对资源禀赋、贸易程度以及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Easterly 和 Levine (2002)对地理位置、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等。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体现在王文博等(2002)计算出1981~1999年中国制度因素主成份的数量,得到一个中国制度因素主成份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将从业人数、物力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R&D的时间序列与制度因素主成份的时间序列再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出包含制度因素的计量经济学方程,进而分析制度的贡献。

第三,从制度变量的指数构建研究来看,国际上所采用的制度的量化指标体系主要有美国和加拿大三大机构使用不同的指标构成体系测度的经济自由度,^①但是正如 Hank 和 Watters(1997, P2)指出的,他们在很多标准上达成了一致:(1)产权保障;(2)鼓励对外开放;(3)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4)政府财产税收的自由度(Kaun, 2002)。我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市场化程度及其测度的研究也不多,自从卢中原、胡鞍钢(1993)首次提出市场化指数以来,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只有寥寥的几部(卢中原、胡鞍钢, 1993;江晓薇、宋红旭, 1995;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 1996;顾海兵, 1997;陈宗胜等, 1998、1999;樊纲等, 2001, 2003, 2004;高明华, 2003),在此基础上有为数不多的文献研究了市场化(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金玉国等, 1998、2001;王文博等, 2002;王立平等, 2004)。在市场化进程研究方面较新的进展是樊纲、王小鲁等(2001, 2003, 2004)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和

《华尔街》杂志(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方法(Marc A. Miles 等, 1995~2004)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构造市场化指数, 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进行了测度, 使用5个方面19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构造制度变量, 不依赖于“专家评分”等主观因素, 较之前的研究更加客观, 该文构造的市场化指数, 如其所说:“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变量’。”

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中可以看出, 当前同类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结合中国经济增长背景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测度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显得较为薄弱, 主要表现为: 第一, 对制度因素如何进行量化的方法选择上还有争论, 未能得到普遍认可的有效方法; 第二, 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国内外研究存在较大差异, 如何构建衡量我国制度变迁的指标体系还有必要进行系统和科学的研究; 第三, 模型方法过于单一、结论说服力不强, 目前仍然没有得到较为普遍认可的分析研究成果。

关于模型形式的选取和制度变量的量化问题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方面。目前研究中所采用的模型方法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回归相关分析方法; (2)虚拟变量法; (3)余值法(或扣除法); (4)强估计(Robust Estimate)分析法; (5)Granger 因果关系分析法; (6)极值边界分析模型(the extreme bounds analysis, EBA)。为了测量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许多研究者都采用了代理变量的方法。如使用非国有化程度(或产权私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额占GDP的比率等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 进而对这种代理变量进行量化, 形成一个关于代理变量的时间序列, 再用这个时间序列与GDP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以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 这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所选代理变量是否是制度变量或制度变迁的“射影”, 是否具有统计学上所说的效度, 分析结果是否具有信度。另外, 通过对制度量化分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实际上是分析在相同的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条件下, 制度状态不同, 生产效率的不同。测度这种贡献率就是测度由制度变迁导致的生产向生产可能性边界前进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程度。本项研究由于数据等方面的局限性, 最终仍然选用了非国有化率作为制度代理变量测度对江、浙两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着力于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模型实践, 通过GRANGER 因果检验验证变量关系的合理性并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得出数理结论。

二、江、浙两省经济发展背景与现状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经济增长举世瞩目,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令经济学者们聚焦于“中国奇迹”。同时, 长三角地区又走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列, 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江苏省和浙江省作为我们研究的样本地区, 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 政府对于经济监管当中的“淡化微观, 强调宏观”^②的思想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 两省自改革以来, 通过农村工业化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苏南模式”^③和“温州模式”, 比较两地区发展模式, 我们发现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浙江省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相比之下江苏省集体所有制工业比重较大。体现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比例上, 两省差异不大, 见表1:

表1 1995~2007年江、浙非国有化率(R, 单位100%)与GDP总量(当年价格, 单位亿元)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K, 当年价格, 单位亿元)与从业人员总数(L, 单位万人)

年份	江苏GDP	浙江GDP	江苏R	浙江R	K江苏	K浙江	L江苏	L浙江
1995	5 155.25	3 557.55	0.75	0.72	1 764.76	1 482.62	3 765.4	2 700.7
1996	6 004.21	4 188.53	0.76	0.72	1 963.06	1 611.44	3 747.7	2 701.9
1997	6 680.34	4 686.11	0.76	0.73	2 174.97	1 608.56	3 745.5	2 700.3
1998	7 199.95	5 052.62	0.74	0.67	2 450.40	1 801.70	3 635.0	2 651.0
1999	7 697.82	5 443.92	0.77	0.68	2 441.90	1 958.10	3 596.0	2 661.0
2000	8 553.69	6 141.03	0.80	0.71	2 570.00	2 350.00	3 559.0	2 700.0
2001	9 456.84	6 898.34	0.85	0.74	2 823.20	2 834.90	3 565.0	2 772.0
2002	10 606.85	8 003.67	0.86	0.77	3 450.10	3 477.50	3 506.0	2 835.0
2003	12 442.87	9 705.02	0.87	0.81	5 233.00	4 740.30	3 610.3	2 961.9
2004	15 003.60	11 648.70	0.85	0.82	6 557.10	5 781.30	3 719.7	3 092.0
2005	18 305.66	13 437.85	0.85	0.85	8 165.40	6 520.10	3 877.7	3 202.9
2006	21 645.08	15 742.51	0.86	0.86	10 069.20	7 590.20	3 931.8	3 372.3
2007	25 741.15	18 780.44	0.87	0.88	12 268.10	8 420.40	4 193.2	3 615.4

注:其中非国有化率 = 非国有工业总产值 / 工业总产值, 由笔者计算。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

2007年,从人均水平看,浙江人均GDP高于江苏,浙江与江苏的产业结构更是高度趋同,均呈二、三、一结构。在1995~2003年期间两省GDP增速平缓,在近5年又呈现了明显上升,其中江苏增速最为明显。从非国有化率来看,1995年至2003年期间江苏省非国有化率明显高于浙江省同期水平,而2005年之后两地相当,甚至浙江省超过了江苏省。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财政注入资金大力扶持重点企业,同年非国有化率明显下降,浙江由0.73下降到0.67,江苏下降幅度最小由0.76下降到0.74。

考察1995~2007年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由1995年的1 764.76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2 268.1亿元,换算为可比价格增长约4.5倍;其次为浙江由1995年的1 482.6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8 420.4亿元,换算为可比价格增长约3.9倍。同期,浙江省劳动力增长最多,由1995年的2 700.7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3 615.4万人,增长约0.34倍,江苏省由1995年的3 765.7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4 193.2万人,增长约0.11倍。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1995~2007年江苏省经济增长势头高于浙江,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应该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江苏经济增长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同时,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已取得重要成效。江苏省改革开放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如:国有经济企业改组、改制活动,使许多产业资源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得到了有效规制,国有存量资产向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和领域集聚,向产业层次、经济层次的高端集聚,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各种改造和深层次的变化由于具有较大的市场压力,更是快于国有企业,都进一步加强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因此而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浙江省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释放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6年间所启动的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增长速度最快的过程。在1984和1985两年时间里,浙江省的GDP增幅甚至高达22%。如此高的增长速度,导致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所需

的超前增长速度,相对于GDP快速增长而言严重不足,以至于在后期由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而出现了经济的大幅回落,198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经济的波幅为22.3%,不仅没能实现软着陆,而且几乎抵消了前两、三年所产生的增长。随着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兴起了又一轮的快速增长。经历了1989年的增长低谷期之后,1991年又进入GDP超过两位数的增长阶段,1993年甚至达到22%。1992~1995年间,浙江省经济在19.4%的高位运行,最终所导致的是又一轮的经济过热。随着各种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增长速度回落到了12.7%。较大的经济波动导致关联产业间的生产能力不协调,轻加工业的快速增长在基础设施投资没有到位的前提下,导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没能很好地实现生产能力,而每一次调整,都会导致相当一批固定资产投资最终转变为沉没成本。1995~2007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总体较为平稳。

三、制度因素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经济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制度变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体现出重要的作用,然而制度的复杂性是学者公认的、制度的量化是至今学术界仍有很大争议的问题。为此,我们选择非国有化率来衡量市场化制度变革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此作为以下定量研究的切入点。

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在我国描述经济增长的要素(包含制度因素)对我国总量及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作用的生产函数模型主要有以下3种形式,制度独立要素模型、人力资本增进型制度内生模型和物质资本增进型制度内生模型。

制度独立要素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Y=A(t)K^{\alpha}H^{\beta}e^{\lambda s} \quad (1)$$

其中,Y代表各地区GDP,K代表各地区资本存量,H代表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从业人员规模与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之乘积),s代表各地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α 为资本存量产出弹性, β 为人力资本存量产出弹性, λ 为制度影响系数。

对式(1)两边取对数得到该模型的线性化形式:

$$\ln Y = \ln A + \alpha \ln K + \beta \ln H + \lambda s \quad (1')$$

人力资本增进型制度内生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Y=A(t)K^{\alpha}(He^s)^{\beta} \quad (2)$$

其中,Y、K、H、s、 α 、 β 的含义同模型(1);这里 β 也含有制度影响系数的意义。

对式(2)两边取对数得到该模型的线性化形式:

$$\ln Y = \ln A + \alpha \ln K + \beta (\ln H + s) \quad (2')$$

物质资本增进型制度内生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Y=A(t)(Ke^s)^{\alpha}H^{\beta} \quad (3)$$

其中,Y、K、H、s、 α 、 β 的含义同模型(1),这里 α 也含有制度影响系数的意义。

对式(3)两边取对数得到该模型的线性化形式:

$$\ln Y = \ln A + \alpha (\ln K + s) + \beta \ln H \quad (3')$$

以下,为了研究制度因素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选取了江苏省和浙江省1995~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时间序列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

以非国有化率来代表制度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我们采用了表1中1995~2007浙江省和江苏省年度统计数据(其中GDP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数据都根据价格指数调整为1994年可比价格),用EViews3.1软件对模型(1)、(2)、(3)式分别进行估计,发现采用物资资本增进型制度内生模型能够最佳拟合数据,模型形式如下:

$$Y = (Ke^R)^{\alpha} L^{\beta} \quad (4)$$

其中Y代表经济总量,即GDP;K代表资本存量(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L代表从业人数; α 和 β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这里 α 也含有制度影响系数的意义;R代表制度因素,用非国有化率=(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代表。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回归结果表

浙江省		江苏省	
自变量	回归系数(T值)	自变量	回归系数(T值)
$\log(K) + R$	0.045* (1.92)	$\log(K) + R$	0.047*** (7.29)
$\log(L)$	0.62*** (4.76)	$\log(L)$	0.97*** (138.93)
拟合度 R^2	0.99	拟合度 R^2	0.96

注: *、**和***表示显著性水平为90%、95%、99%。

由于以上结果通过了统计检验和计量经济检验,因此得到包含制度变量的生产函数的估计模型如下:

$$Y = (Ke^R)^{0.045} L^{0.62} \quad (5)$$

由(5)式可以看出:除了资本和劳动外,制度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资本产生作用的,因此属于物资资本增进型。制度作用于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045,而劳动的产出相对较大为0.62,表明当增加1%的资本投入时,通过制度的促进会带来产出增加0.045%,当增加1%的劳动投入时,会带来产出增加0.62%,这一阶段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其中制度因素(非国有化率)促进了物资资本的投入向有效经济增长的转化。

$$Y = (Ke^R)^{0.047} L^{0.97} \quad (6)$$

由(6)式可以看出:除了资本和劳动外,制度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资本产生作用的,因此属于物资资本增进型。制度作用于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047,而劳动的产出相对较大为0.97,表明当增加1%的资本投入时,通过制度的促进会带来产出增加0.047%,当增加1%的劳动投入时,会带来产出增加0.97%,这一阶段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其中制度因素(非国有化率)促进了物资资本的投入向有效经济增长的转化。

同时,为了验证变量选取的合理性,下面使用时间序列变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本原理:

原假设 H_0 : A不是B的因(A does not Granger Cause B)

B不是A的因(B does not Granger Cause A)

通过比较F统计量的值与F临界值的大小,当F统计量的值显著大于F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认为A与B存在因果关系,反之,不存在。

检验结果如下：

表3 浙江省GDP、K、L、R的Granger因果检验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Lags: 1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L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ZHE	12	8.78494	0.01586
GDPZH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Z		2.08130	0.18300
K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ZHE	12	10.3053	0.01066
GDPZH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KZ		4.77142	0.05677
R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ZHE	12	8.09537	0.01924
GDPZH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Z		0.38501	0.55032
R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KZ	12	13.2184	0.00544
K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Z		0.02522	0.87733

由上表可知，浙江省1995～2007年间劳动、资本和制度变量是GDP变化的原因，同时制度变量是资本劳动变化的原因更为显著，因此，我们建立的浙江省资本增进型的计量模型是合理的。

表4 江苏省GDP、K、L、R的Granger因果检验

Pairwise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Lags: 2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LJ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JIANG	11	7.13032	0.02597
GDPJIAN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J		7.87399	0.02100
LJ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JIANG	11	12.7287	0.00694
GDPJIAN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KJ		0.88422	0.46074
RJ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JIANG	11	6.12280	0.03556
GDPJIANG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J		0.63469	0.56229
RJ does not Granger Cause KJ	11	3.53263	0.09685
KJ does not Granger Cause RJ		0.50443	0.62735

由上表可知，江苏省1995～2007年间劳动、资本和制度变量是GDP变化的原因，同时制度变量是资本劳动变化的原因也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建立的江苏资本增进型的计量模型是合理的。

综合上述计量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以非国有化率来衡量市场化制度变革对江、浙两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明显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因素变化最为根本的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所有制结构变化又突出表现为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江苏和浙江制度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独立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主要表现为非国有经济作用于物资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制度因素与江、浙两省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制度建设是江、

浙两省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一系列有效政策的实施,引导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江、浙两省快速发展,对全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实证研究结论显示浙江省和江苏省资本、劳动力、和制度都是GDP变化的显著原因;制度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显著的:浙江省1995~2007年期间制度主要作用于资本对GDP的贡献为0.045个百分点;江苏省1995~2007年期间制度主要作用于资本对GDP的贡献为0.047个百分点。

本文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仅选取了以非国有化率来衡量市场化制度变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不能完全体现制度因素的作用。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我们在理论分析部分所提到和探讨的市场化指数的数据无法有效测算,函数形式相对比较成熟的是套用C-D生产函数的形式,我们也采用了这种方法,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适当地将制度变量添加到传统的只有劳动和资本变量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这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注 释:

- ① 美国 Heritage Foundation(Johnson et al., 1998)和 Center for Policy and Legal Studies(CPLS)等, CPLS 最早进行了省级数据(美国的州)的测度,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定量测度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自由度,和加拿大 Fraser Institute(Gwartney, 1996, 2001)和自由之屋(Freedom House, 2002)一起,此三机构都致力于关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经济自由度进行了测度。
- ② 于效梅. 长三角区域经济制度演化趋势分析和建议[J]. 科技咨询. 2008. 09.
- ③ 苏南泛指江苏省南部地区, 通常包括苏州、无锡和常州。

参考文献:

- [1] [美]道格拉斯·C. 诺斯, 罗仲伟译. 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第二辑)[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 [2] 林毅夫. 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 [3] 孙斌栋. 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 [4] 陈宗胜.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5] 王小鲁.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 经济研究, 2000, (7).
- [6] 樊纲, 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4 年度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 [7]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2000 年报告[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 (3): 17-27.
- [8]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朱恒鹏.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 经济研究, 2003, (3).
- [9] 卢中原, 胡鞍钢. 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 经济研究, 1993, (6).
- [10] 黄少安. 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4).
- [11] 黄少安.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事实对“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的证实[J]. 浙江社会科学, 1999, (1).
- [12] 魏建, 黄少安. 产权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良性互动——山东诸城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改革与发展纪实[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0, (5).
- [13] 王文博, 陈昌兵, 徐海燕. 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02, (3).
- [14] 张曙光. 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 市场、政府和道德[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 (3).
- [15] 杨瑞龙. 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 经济研究, 1998, (1).
- [16] 黄少安. 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兼评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假说”和“三阶段论”[J]. 经济研究, 1999, (1).
- [17] 黄少安. 所有制结构及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一般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 1999, (4).

- [18] 江晓薇, 宋红旭. 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 管理世界, 1995, (6).
- [19] 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 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 宏观经济管理, 1996, (2).
- [20] 顾海兵. 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 管理世界, 1997, (2).
- [21] 陈宗胜, 等. 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8, (香港)夏季号.
- [22] 金玉国. 1984~199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制度解析[J]. 统计研究, 1998, (5).
- [23] 高明华. 中国企业市场化进程研究[J]. 管理世界, 2003, (8).
- [24] 翁志伟, 等.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J]. 当代经济, 2009, (1).
- [25] 于效梅. 长三角区域经济制度演化趋势分析和建议[J]. 科技咨询, 2008, (9).
- [26] Miles, M. A., Feulner, E. J., O'Grady, M. A., and Eiras, A. I. The 2004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M].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4. 2: 39-42.
- [27]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2001-2002[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 [28] Hanke, S. H. and Waters, S. J. K., Waters, economic freedom, prosperity, and equality: a survey [J]. Cato Journal. 1997. 1997 (<http://www.cato.org/pubs/journal/cj17n2-1.html>)
- [29] Coase, R.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 1937 Nov. 4: 386-406.
- [30] Kaun, D. E., What does economic freedom buy? [J].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2. 31: 371-390.
- [31] Alesina, A., Ozler S., Roubini N. and Swagel P.,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2.1(2): 189-211.
- [32] Helliwell, J., 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 [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4. 24: 225-248.
- [33] Barro, R. J., Democrac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1(1): 1-27.
- [34] Chowdhurie-Aziz M., Political Open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January 1997.
- [35] Narayan, Pritchett,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USA. 1997.
- [36] Rodric, D.,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olicy Reform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5. Vol. 34: 9-41.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 on Economic Growth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CHEN Hua XU Jian-hu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ly studying the data from 1995 to 2007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nd mak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two provinces. Firstly, we discuss the reasonable casual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using time-series analysis method and GRANGER test; Secondly we apply the C-D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set up the econometric model to calibrat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to economic growth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hirdly, we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institutional factor, especially non-SOEs development, has pushed the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 has produced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by physical capital input.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factor; economic growth; ratio of non-SOEs